

目 录

- 一、福建事变历史的回顾…福建林柏舟 (1)
- 二、忆陈子锜老师……………谭炜基 (18)
- 三、文史札记……………陈大远 (20)
 - 1、黎耀宗的《铜鼓歌》与铜鼓
 - 2、孙中山先生对罗定交通干线的设想
 - 3、明清的罗镜
 - 4、清末民国罗定的匪患
- 四、解放前后罗定城乡的一些民间文艺组织……………
 - 陈翹英、陈朴南访录 黄津源整理 (37)
- 五、略谈罗定的水文事业……………
 - ……………陈卓一供稿 黄津源整理 (42)
- 附录：黎耀宗《铜鼓歌》有序…… (46)

福建事变历史的回顾

林柏舟

（一）《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入闽的政治背景和局面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侵入我国东北的大规模军事侵略行动在上海的重演。当时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率领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下，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同上海人民一道奋起抗战。在孤军奋战的艰难环境下与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整整打了三十三天，使日寇三次增兵，三易其帅，终不得逞。但是蒋介石政府继续采取妥协投降政策，与日本帝国主义举行和谈，于五月五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将上海变为自由市，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把整个上海出卖了。协定签订第二天，蒋介石就下令将十九路军三个师分遣皖、鄂、赣参加内战。这个肢解抗日的十九路军的阴谋遭到多方反对，蒋又于五月二十一日，改调该军到福建“剿共”。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十九路军入闽是应时势要求，双方都有各自的打算。从蒋介石的阴谋用意来说：①宁沪一带是蒋家的心腹地带，不将十九路军调离，实为心腹之患；②调十九路军往福

建担任“剿共”任务是要借共军抵消十九路军力量，以利于他消灭红军和什牌军；③可对广东施加压力，使陈济棠有所顾忌，易于就范。从十九路军方面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意图：①全军转进福建，可避免与蒋系部队发生摩擦；②全军在沪抗战损失甚重，尚未得到休整，进驻福建，拥有一省地盘，回旋有地，可以整军经武，充实力量，徐图发展；③“剿共”的内战，官兵十分厌恶，看政治方向必要时与红军携手，并肩抗日，以伸抗日救国宿愿。有此几点，所以他们也乐于接受蒋介石的调遣，在表面上看是很服从，但在骨子里是有他们的打算的。

六月八日，该军入闽的先头部队由海运至泉州、秀涂登陆，至七月初旬该军全部入闽。年底福建省政府改组，蒋光鼐任省府主席。该军总指挥部驻扎漳州，总指挥蔡廷锴兼任绥靖公署主任。

“一·二八”事变使十九路军全体战士看清了蒋介石卖国求荣的真面目。入闽后，便以福建为基地俟机开展反蒋运动，因此先后解决了亦匪亦军的陈国辉、张贞等国民党什牌部队，迫使其他地方武装势力就范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同时迫于蒋介石的压力，也进行“反共”行动，出兵进占闽西苏区和闽南游击区，还在军内外镇压共产党员。

（二）闽变前的国家政治形势

一九三二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关内。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发表了“团结抗日”的宣言，提出“救亡”三个条件，使正在“剿

共”的十九路军广大官兵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因此，当热河告急时，蒋光鼐致电张学良、汤玉麟表示要简选精锐候命北上，蔡廷锴亦以十万火急电请南京政府准予请缨援热（热河）。

五月间，蒋介石集团准备再行出卖华北、平津等地，不顾全民的反对，乃于五月三十一日与日本帝国主义再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签订后全国舆论哗然，更使十九路军领导人深刻认识到要抗日必须反蒋，要反蒋抗日必须联共，如今红军通电团结抗日，正好与中共建立密切关系。

（三）闽变之酝酿与促成

同年五月间，前在南京被蒋介石迫走而飞欧洲的陈铭枢亦于是时回到香港。他的志愿总为救国，要救国就必须倒蒋以伸抗日救国之志。他在香港即派梅龚彬去上海找中共联络，并暗中与第三党合作，做好反蒋的准备。跟着，他秘密入闽，于二十二日到达福州。六月初，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邓世增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联粤、桂与联共，集结军事力量。会后陈、蒋分别去香港与李济深讨论进行计划，随后赴广东与陈济棠协商，因意见相左，不能协同。他们又派尹时中赴广西游说李宗仁、白崇禧。在时机与利害方面，李、白他们认为操之过急，又不能合作。两广力量既然无法统一，那么，就只有走联共这条道路。

此时的南京蒋介石，在政治情报中，已知十九路军有反对他的企图，就又来一次肢解的阴谋，命令十九路军两个师北上“剿共”，事先又停止一切军事给养。这时正值九月初

旬，十九路军的区寿年师正在闽西连城朋口“剿共”失利，十八日在青州的三六六团又被歼灭。这时十九路军领导人处境十分困难：如不“剿共”必被蒋介石消灭；如积极“剿共”也必然被红军消灭。因此非下决心倒蒋不可。问题与条件很清楚：如要倒蒋必须联共，否则单独作战是难以支持的。

此时，在联共道路上，密使梅龚彬通过胡鄂公在上海与上海与中共联络，尚无消息。为尽快地取得中共的条件，又派出陈公培为代表到中共苏区前线联系。于九月二十二日到达五台与彭德怀、袁国平进行会谈。随后，彭即电告苏区中央，并给蒋、蔡写了回信，请即派代表到瑞金谈判。从此，延平前线进入休战状态。

就在这次接触中，打开了谈判之门。进入苏区瑞金的全权代表是十九路军总秘书长徐名鸿，由陈公培陪同前往。双方以抗日三个条件为原则初步议定《抗日反蒋同盟协定》十一条，于十月二十六日签字。随后，苏区派潘汉年为代表，黄火青为秘书，随徐、陈到福州。

初步协定签订后，于十一月初陈铭枢、蒋光鼐、徐名鸿等前往香港在李济深家中开会讨论赴闽组织人民政府事宜。在举事之先，他们邀请抗日反蒋目标一致的人士李济深、陈友仁、徐谦、李章达、黄琪翔、章伯钧、郭冠杰、余心潜、叶挺、欧阳予倩等前来福州。为了统一思想，蒋光鼐、蔡廷锴曾分别在漳州、龙岩、南靖、福州等地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说明“联共反蒋”是存亡形势所迫的道理。在这些会议中，毛维寿等一些人在态度上就表现出暧昧的色相。

(四)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主要活动与部署

这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对于福建的十九路军的行动早已全部了解。他要出了一套“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之”的“先礼后兵”手段，电邀蔡廷锴到庐山会晤，并请出林森入闽诱劝陈铭枢，均告失败。第二步，他于十七日又派专机飞闽要接蔡前往南昌，但“闽变”形势已如箭在弦，索性将飞机与飞行员一并扣留。

当此风云紧急之际，十一月十五日，福建所有领导人和上层人物在福州乌石山蒋光鼐家中举行高级会议，除戴戟、曾蹇、邓瑞人等反对外，通过了于二十日举事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时许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一百多人和十九路军驻福州官兵以及省市各机关团体群众数万人在福州南较场（今五一广场）召开“中国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前推选十七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大会主席黄琪翔致开幕词，然后李济深、陈友仁、余心清、姚煜昌、王凤超、蔡廷锴、蒋光鼐等相继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黄琪翔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然后，各种提案统经大会通过，计有《人民权利宣言案》、《组织人民政府案》、《制定新国旗案》等议案。此时会场升起了上红下蓝中嵌一颗五角黄星的国旗。大会结束时除高呼口号外，全体代表摄影留念还整队游行。

当晚八时，大会主席团在绥靖公署开会决议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暂设在福州。同时会上选举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冯玉祥

祥（余心清代）、蔡廷锴、蒋光鼐、黄琪翔、徐谦、方振武（后改戴戟）、李章达、何公敢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人民政府主席。二十一日下午三时许，主席团开会研究政府人选，决议政府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二十二日人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大会主席团主席梅龚彬向主席授印，李济深与其他政府委员同时就职。二十四日，人民政府委员徐谦宣布政府任命：李济深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任文化委员会主席，余心清任经济委员会主席，蒋光鼐任财政部长，陈友仁任外交部长，徐谦任高等法院院长，李章达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接着，各部门领导人宣誓就职，随后成立秘书处，彭泽湘任秘书长。

福建人民政府将福建省划分为“闽海”、“兴泉”、“龙潭”、“延建”等四个省和“福州”、“厦门”两个特别市。分别任命何公敢、阮淑清、戴戟、陈公培、许友超、徐名鸿、萨镇冰、郭冠杰等为正副省长，黄强为厦门市市长，邱兆琛为福州市公安局局长，福州市不设市长，试仿效西方政体，建立联邦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五）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十九路军的军事形势

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军事形势要求必须充实扩大力量。在政治已形成下，十九路军这支中坚队伍必须加劲壮大，改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蔡廷锴任总司令。全军扩大编制，下辖五个军计十个师，以沈光汉为第一军军长，毛维寿为第二军军长，区寿年为第三军军长，张炎为第四军军长，谭启秀为第五军军长，陈铭枢兼任总政治部主

任，魏育怀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陶若存为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林一元为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郑丰为第四军政治部主任，谭冬菁为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在这五个军编制外，还有一个独立师，两个独立团，两个空军大队，两个海军陆战队独立旅，以及特务团等正规武装。为了进一步收编民军，命翁照恒为第六军军长，成立兴（兴化）、泉（泉州）、永（永春）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再命徐名鸿、傅精萃等人负责整编闽西地方武装，作为闽西善后处部队。

与此同时，中共苏区派潘汉年、张云逸为代表进入福州。十九路军亦派尹时中为代表进入苏区瑞金，担任联络。

（六）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后的政治措施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后，一共召开了十六次委员会会议，先后颁发《政府成立宣言》、《人民纲领——最低纲领十八条》以及宣言等一系列历史性的政策法规。对外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争取国家领土主权之独立完整”、“打倒蒋介石的卖国残民南京政府”、“否决一切帝国主义所有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等。对内提出：“打倒封建性的残余势力”、“取消党治”、“还政于民”、“人民有身体、居住、文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示威、请愿、罢工等之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

为了进一步宣传反蒋，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表《告全国武装同志书》，十二月六日颁发《通缉蒋介石》的布告，还在报刊《人民日报》揭发蒋介石的种种卖国罪行。

十一月二十一日，为了反对蒋介石把持操纵下的国民党残民卖国政策，因此由李章达倡议领衔，陈铭枢、李济深等人通电脱离国民党组织。二十四日，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也同样通电脱离国民党，随后各部队武装官兵，以及地方社会的机关团体，均前后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再有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也于十二月十一日发表启事，宣告脱离国民党的控制。以上各种行动结束后，必须另行组织产生新政党，各派领导人作出决定，以集体签名方式发起成立“人民党”，由陈铭枢任总书记，并起草了党纲。与此同时，地方的群众组织也先后成立了工会、农会、商会、学生联合会、记者联合会、妇女协会等团体。

（七）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经济措施和农村土地政策

人民政府是具有政治权力的机构，在军事政治形势配合下，对于经济方面更必须提出适当措施，以求安定。当时，对外主张：“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厉行关税自主”、“外资经营及外人管理之企业如有危害中华民族利益，应予制裁、没收之”。对内提倡：“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实行计口授田”等种种措施，于十二月二日人民政府在第七次会议通过。十二六日颁发命令保护工商资本。与此同时，部门领导人还召集商人开会，解释政策法规，以消除工商界的疑虑，安定情绪。

在农村方面，土地政策从计口授田着手，于十二月九日至十三日先在厦门《江声日报》上连续发表公布了《闽西计口授田方法》，其中包括《计口授田暂行法》、《授田细

则》、《授田分配技术》、《授田纪律》、《授田宣传纲要》等等，并由“农村复兴委员会”派员赴各地指导。除此之外，人民政府还分别于十二月十二日及二十八日发布了诚勉公务人员为革命尽忠职责和厉行节约的通令。为了节流，还对文武职员作了相应的减薪，以解决财政困难。军内还实行官兵同桌共餐，以示平等。

人民政府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土地等政策法规以及基层团体组织的体制虽然粗具雏形，但遽遭风雨般的军事不利影响，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不安的战争状态中，实施甚少，都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就随大势而解体。

（八）福建人民政府与中共签署的初步《同盟协定》几条的实施

福建人民政府与中共双方根据初步《协定》的第一、六、七条款有关双方交通的安全与经济通商的交往，在人民政府成立后，即派陈子航为代表，到长汀与中共代表张云逸、方方等进行谈判，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代表签订《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明确划分军事疆界线，解决交通的安全。进一步又根据《协定》第二、十五款，苏区中华商业总公司总经理赖祖烈，副总经理刘秉奎等受林伯渠、毛泽民指派前来龙岩与闽西善后处陈子航、傅柏翠进行贸易谈判并达成协议。从此双方进行贸易交往，直至一九三四年二月才中断。

为了使双方所签订的协定次第付之实施，福建人民政府根据《协定》第三、四条款，于十二月一日发布了《大赦

令》，指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及其御用的国民党毫无犯罪之可言”，即由高等法院、闽候地方法院分别于十二月四、五、七日释放在押全部政治犯，其中有中共党、团员，如马立峰、范式人、蔡明善、杨平衡等。同时，在中共福建地下党领导下的一切进步团体亦公开活动，如福州、厦门等地的“反帝大同盟”等是。

一九三三年年底，中共中央指派罗明到福建推动地方党与十九路军配合，并协同驻闽代表联络员谢子梅与人民政府合作。

（九）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南京方面的军事与政治行动

“闽变”爆发后，国内外皆震动，南京的独裁者蒋介石更寝食不安，为防止事势燎原，他使出一贯的手段，派人四出活动，对西南两广进行利诱收买，于是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先后公开通电反对“闽变”。一方面他又派陈仪赴日本，派李择一与驻华日军洽商，请求协助镇压“闽变”。还照会各国驻华大使馆，要求不要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发生任何外交关系，再派遣大批特务潜入福建前线与十九路军总部参谋处长范汉杰联络，进行收买分化工作。这个处长是蒋介石早期派来潜伏的坐探，“闽变”的一举一动，南京方面瞭如指掌。所以“闽变”的失败是十九路军军内个别的军、师、团长接受利诱，伺机倒戈作为内应的结果。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晚，南京国民党就“闽变”问题急忙召开第三百八十四次中政会议，请国民政府严厉处

置，除通令各省、市政府，各军政机关“协力镇压，务使叛乱克日救平”外，二十二日蒋介石继续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并派飞机到福建广为散发，汪精卫亦通电各省、市政府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闽变”。二十三日国民党第九十九次中常会议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等人的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军事方面召集熊式辉、顾祝同、陈诚、杜蔚等会议，决定改第五次“大围剿”转而先解决“闽变”。随后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浙江、江西等地调遣嫡系部队，计有十五个师由张治中、蒋鼎文、卫立煌、顾祝同等分别率领，分为五路，大举兴师。大军先头部队由浙江仙霞岭入闽，并出动飞机连续疯狂轰炸，又派海军舰只封锁福建沿海。当蒋军占领闽北广大地区时，蒋介石也亲自入闽坐镇建瓯指挥。

（十）福建人民政府与中共初步签订的同盟协定由于中共左倾领导人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而未能全部实现

当福建战密云密布的时候，苏区中共上层领导人于要不要支援十九路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彭德怀向中央提出利用这有利于时机，以五军团坚持中央苏区斗争、集中一、三军团和其他部队出击，向闽、浙、赣地区进军，掩护福建事变的建议，与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应纵横于苏、浙、皖、赣的主张是一致的。这样既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又能援助十九路军。但当时“左”倾的领导者不但没有接受，还指责为是“脱离中央苏区的冒险主义”。他们认为“红军继续在东

线行动向蒋介石的侧后方进攻也等于帮助十九路军；“现在我们不能再吃亏”；“不如借此机会得以某种形式休息一下”。

当蒋军顾祝同部入闽时，周恩来要求中央出兵侧击过资溪、光泽之敌，但“左”倾领导者又加以拒绝。福建人民政府又派军事代表尹时中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九日到达瑞金请求红军迅速出兵支援，以救面临困难局面，但又被博古（秦邦宪）等人一拖再拖，未被采纳。但是彭德怀还是频繁地向十九路军方面提供蒋军行动情报。最后，周恩来为十九路军的军事不利而克服重重困难要使东方军再入闽援助，然已为时过晚。这样，由于中共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没有给福建人民政府以应有的援助，在蒋介石的猛烈围攻下，内部不团结的福建人民政府终于失败了。

（十一）战争序幕揭开，十九路军孤军应战，以至崩溃

蒋军十万大兵压境，以十九路军五个军（实即五个师）的力量（而且内部一些师、团长怀有贰心）来对付十五个师的强敌，即使确有忠于“闽变”的官兵也觉士气低落。“闽变”前途如何，后果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当蒋介石坐镇建瓯的时候，刘和鼎竟然倒戈以迎，并且担任向导，蒋军一路的张治中，宋希濂部抵达延平，分一路围古田。十九路军对这两个地方虽有两个师扼守，但都是新兵，战斗力较差。此时驻守延平的司徒非师，因九峰山屏障被突破，于六日向刘和鼎部接洽投降。八日，守古田的赵一肩师，在张治中的诱骗下也投降了。军

长谭启秀只率领一小部退回白沙。当晚水口亦告失守。原拟定在闽北决战的意图被搞乱了。但区寿年部的第三军在郊尾已遇上了敌人，敌军卫立煌部，以卢兴邦为引导，在龙溪口渡过闽江与区部在郊尾展开战斗，激战一夜。同时蒋军卫立煌部向闽南迂迴。在福州外围失守的紧急情况下，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人还在白沙前线开会，遂决定放弃福州，向闽南撤退，就将原计划增援延平、古田的第一、二、三军和集中在福州的第四军即刻沿福厦公路面向闽南作全线总退却。（一月十三日风云紧急时人民政府内部各机关停止办公，各部门领导纷纷外逃，中共驻闽代表潘、张、黄等三人亦相继撤回苏区）。

次日，蔡本人到郊尾指示区寿年后撤，速向泉州集中。蔡即乘车退回泉州。当蔡车抵达涂岭时，不期敌人已先行占领该地，居高临下，向蔡的坐车射击，蔡车冒险冲过，随后的警卫汽车被敌人截住，车中卫士在战斗中全部牺牲。后撤部队到黄昏时抵达此地，有区寿年部两个师，沈光汉一个师、张炎一个师、邱兆琛的先遣队两个团。涂岭形势险要，一边临海，一边高山绝壁，只有一条狭窄隘口通道可走（蔡车就在这个隘口遭到袭击）。在夜幕初张的时候，由区寿年担任指挥与敌展开激烈的战斗、至夜半才把敌人打退，全部始得通过此地向泉州进发。

蒋军占领福州后，蒋介石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节制所有在福建的部队。此时卫立煌部沿莆田、仙游、惠安、泉州一线，配合蒋鼎文的第三师及第九师取进厦门，兵不血刃，接受了厦门市市长黄强的投降，除在厦门登陆外，直迫

漳州。汤恩伯部先头部队向安溪、同安前进，完成了包围退集泉州的十九路军。

一月十七日蔡廷锴在涂岭脱险后到达泉州，即令在泉州的毛维寿前往接应。这时毛已有贰心，不听调动。至此蔡亦察觉毛有拔帜反戈之意，即刻乘机飞往漳州，临时留下一张字条交毛转给沈、区二人，在字条中暗示沈、区率部即速向龙岩集中。随后沈、区两人到泉州见到字条，情绪低沉，两天的撤军只前进三十里。这时敌军已进迫至洛阳桥，毛乃派人追沈、区两支队伍回师泉州，说准备在泉决一死战。及沈、区转回，毛乃诡言蒋军已完成包围，形势不能作战，然后才透露蒋介石已委他当第七路军总指挥，问沈、区有何意见，这很明白地迫令沈、区即刻离开队伍，否则就当俘虏。

沈、区走后，所有遗下的部队官兵只有接受改编。至此，十九路军大部分官兵万分愤恨，自行脱离部队各行其道。

在泉州的十九路军叛将毛维寿、张炎等亦于二十一日通电拥护南京政府。以后十九路军所有残部集中莆田整编，全被缴械。

是时，蔡廷锴乘机飞抵漳州，即将周力行（即周士策，共产党员）一个团以及总部的特务团，军官补习班的学员，漳龙省府的保卫部等集中，亲自率领前往龙岩，以待沈、区率部归来再行重整旗鼓。这时徐名鸿亦随同蔡抵达龙岩，时间是一月十九日。随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亦分别到来。面临大势已去的局面，在悲痛中举行了一次临时会议，预计主力集中再作主张。后来获悉沈、区无再来希

望，眼见事不可为，李、陈、蒋、黄才离开龙岩先后经广州前往香港。此时蔡廷锴为了处理所遗残部，拟派林植夫为代表赴苏区联系，只因仅存硕果无几，怕入苏区亦难以立足，乃将所部交黄和春率领，改为陈济棠辖下第三独立旅，以黄和春为旅长，而结束了这个军事未了的遗恨。

（十二）蔡廷锴赴港与徐名鸿遇害

军事遗留的问题告一段落，蔡、徐两人乃取道汕头前往香港。一九三四年二月间，当两人到达永定，徐因要往大埔（在广东与福建交界处）便与蔡分手，化装伤病员，不幸在大埔被广东部队（当地驻军）黄任寰部逮捕，旋即被害。

（后来又有一说：徐到永定后以为已脱险地，乃与蔡分手留在永定，以待爱妻前来一起赴港，所以迟行数天而被捕）此人团长周力行十分机警，得脱离虎口进入苏区。这时黄和春的第三独立旅，不到三个月也被黄任寰缴械，十九路军仅辖的这些少量部队，至此摧残殆尽。

蔡廷锴离开大陆抵达香港，感到往事不堪回首，在此失意之时曾一度出洋旅游，在欧、美、澳洲等地团结海外华侨，宣传救国大计，而后蜚居香港，本着其爱国一贯的主张，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徐谦、冯玉祥、方振武、陈友仁等在港组织民族革命大同盟，创办《大众日报》，为宣传救国路线，倡议推翻南京政府，树立人民政权，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扩大抗日阵营。

（十三）在广西恢复十九路军的旗帜又是昙花一现

福建人民政府解体后，十九路军所有遗下残部纷纷回到广东，为保存这部分力量，十九路军领导人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洽商同意，即行成立一个团，以谢鼎新为团长（谢系广西籍原十九路军团长），后来该团在广西成为一支相当有力的劲旅。

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联合发动所谓“六·一”事变，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此期间，广西李、白为保持广西地盘，在形势的要求下一定要扩军备战由原有两个军扩充为四个军。十九路军的独立团也趁此时机扩为新编第一师，以十九路军旧部翁照恒为师长。当时各党各派各方面的进步人士都得到邀请入桂共商大计，蔡廷锴遂与区寿年、李盛宗于七月间由港取道越南进入广西南宁。林一元与叶少泉亦由广州经梧州入桂，共同参预此事。蔡、区到达南宁后，与有关各方面接触，并经李、白同意乃于八月上旬发表宣言，宣布恢复十九路军建制，并在南宁设立总指挥部，蔡任总指挥，恢复三个师的编制。将原新编第一师翁照恒部改为六十师，另立六十一师、七十八师，以邱兆琛为六十一师师长，区寿年为七十八师师长。突然，广东陈济棠被蒋介石用倒戈的阴谋使广东瓦解，广西已成孤立之势。蒋介石又要出软硬兼施的手段，李、白接受和平谈判，宣布受任第五路军正、副总司令职，军队立即缩编复员，蔡廷锴就十九路军问题与李、白协商，结果该军三个师缩为一个师，归广西部队建制，改为二十六师，以区寿年为师长。九月间，蔡在玉林宣